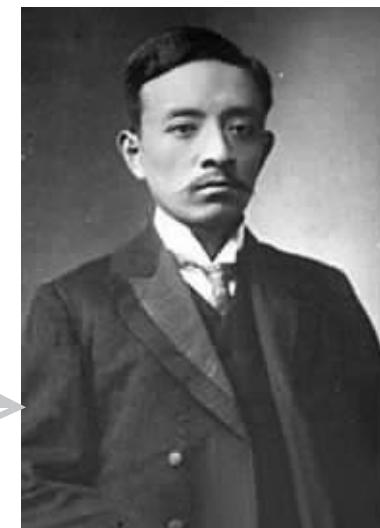


百年
疑案

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谋到底是谁



宋教仁血案的发生，震惊了全国。举国关注之下，案子很快就破了。证据表明，在上海直接指挥武士英行刺宋教仁的人，是青帮出身被袁世凯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之职的应夔丞，而通过电报、信件往来在背后指使这次行动的，则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机要秘书洪述祖。

不过，案子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洪述祖背后的指使人究竟是谁？这成为了民国一大悬案，至今在史学界还有争论。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雇凶者应夔丞与北洋政府关系密切

随着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往来电报和信件被揭露，应夔丞和洪两人的关系，引发了关注。他们是怎么建立“合作”关系的？

辛亥革命前，应夔丞入同盟会，革命党人依仗他的青帮势力闹革命。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帮会势力和革命党人的矛盾就凸显了出来。到1912年底，因与革命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帮会与革命党在南方的联合已经基本破裂。帮会的新组织“共进会”也被严厉打击。

这时，袁世凯政府派出洪述祖南下，向应夔丞抛出橄榄枝。洪述祖，出生于常州一个名门望族。南北和谈时，洪述祖得到袁世凯赏识，革命之后，洪述祖担任内务部秘书一职。应、洪两人一拍即合，为了谋求生存，应夔丞倒向了北洋系，在南方为北洋探得情报。

1912年12月，洪述祖陪同已经被任命为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应夔丞北上，受袁世凯传召。应夔丞大表忠心，表示原共进会中的骨干力量将为袁世凯所用，但袁世凯没有表态。之后，应夔丞从袁世凯那里获得了三万活动经费，并且得到了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召见，获得了一份国务院密码本。

此时，随着国民党力量在议会中的不断壮大，洪述祖和应夔丞的焦点都对准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从1912年10月应夔丞和洪述祖认识后，就与北京方面密电、信件往来频繁，一直到1913年3月23日终止。2月之后的信函，透出了应夔丞与洪述祖手段不断升级，最终成了暗杀。

国务总理赵秉钧否认谋杀宋教仁，矛头引向袁世凯

随着案件同时被曝光的还有应夔丞与赵秉钧的往来电报和信件。赵秉钧，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国务总理。就此，赵秉钧也成了怀疑对象。

赵秉钧被怀疑的首要原因是，洪述祖的身份是内务部秘书，隶属于赵秉钧管理的国务院，洪述祖行事是需要直接向赵秉钧报告的。而且，应夔丞的密码本是赵秉钧给的，另外在应夔丞处查获的往来电文当中，有一份是赵秉钧发给应夔丞的，三份是应夔丞发给赵秉钧的，可见国务院和应夔丞往来密切。

其中关于“宋教仁诈骗丑闻”的电文，就是应夔丞发给赵秉钧的。但是1913年2月12日，赵秉钧将密码本交出，让洪述祖一手打理了，这是他不想参与此事的一个证明。这一方面，是赵秉钧和宋教仁私交甚好，另一方面，则是赵秉钧在政治上想明哲保身。

关于“宋教仁诈骗丑闻”的电文，赵秉钧的辩护词是“没有看过”，将自身与宋案推得

一干二净。袁世凯在答复黄兴要求赵秉钧赴上海出庭的电文中，也为赵秉钧作了辩护。宋案发生一个月后，赵秉钧就要求辞去国务总理一职。他的辞职，和宋案已经引起的舆论狂潮有一定关系。

宋教仁遇刺十天后，国民党在北京为其开追悼会，赵秉钧委派警察总监王治馨到会发表演说，其中提到“杀宋绝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自有人负责”。矛头直接指向了袁世凯。此话一出，袁世凯大为愤怒，借机将王治馨问死罪。

袁世凯默许洪述祖与应夔丞密谋刺宋

那么，究竟袁世凯有没有应许洪述祖、应夔丞谋杀宋教仁？

张晓波在《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中认为，作为总统，袁世凯放任洪述祖刺探有关“宋教仁诈骗丑闻”来打击政敌。洪、应二人在密电中，多次谈到获取“宋案”的价码，这笔钱肯定不是出自洪述祖，而是由袁世凯政府来出。由此可以推论，袁世凯曾经允诺给予洪述祖钱财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袁世凯对“宋案”的关心，使得洪述祖揣摩袁世凯的心理，将对宋教仁的行动升级为刺杀。

陈其美才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刺宋案发生后，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的陈其美，也成为了嫌疑人。陈其美搞暗杀成性，身上命案累累，陶成章、徐宝山、夏瑞芳、郑汝成等都死于他手。

陈其美和应夔丞、武士英都是共进会的成员，应夔丞更是陈其美的密友。辛亥革命后，应夔丞担任陈其美沪军都督府的谍报科长。后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孙中山的接待和保卫。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是由应夔丞组织卫队随行护卫的。因为他身上江湖气太重，孙中山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将他调任临时政府庶务长，但因为应夔丞又有贪污行为，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将他打发回了上海。

正因为陈其美和应、武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宋案发生后，当时就传出了一种说法称陈其美嫉妒宋教仁即将出任内阁总理，于是密谋杀害了宋教仁。

《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作者张耀杰就提出，暗杀宋教仁的真凶是陈其美。据书中披露，1920年，袁世凯儿子袁克文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署名寒云的《辛丙秘苑》，讲述了他在1911年到1915年间的所见所闻，其中“暗杀宋教仁”一节里面，袁克文说，宋教仁被暗杀时他恰好在上海，知道袁世凯几次派遣密使欢迎宋教仁北上，宋教仁欣然

应夔丞雇凶刺杀宋教仁后，其幕后主使究竟是谁，成为不解之谜。袁世凯和陈其美被认为具有重大嫌疑，但一直缺乏充足证据。

应夔丞

启程。

宋教仁临行之前，陈其美、应夔丞等人曾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出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照此分析，应夔丞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夔丞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显得异乎寻常的顺利。另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是，凶手武士英在开审前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宋案中人的结局

赵秉钧、陈其美死于暗杀，洪述祖被绞死

继1913年4月24日即武士英在监狱神秘死亡之后，1914年1月19日，脱狱后的应夔丞在京津火车上被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派人杀死。一时间，南北都认为赵秉钧是主谋。赵秉钧深感冤枉，亲自发电通缉凶犯，并且对袁世凯多有抱怨，称“以后还有谁肯为总统做事”。2月19日，袁世凯令已经递交辞呈的赵秉钧兼署直隶民政长，以示安抚，同时派人买通赵秉钧的厨师，在食物中投毒。2月26日，赵秉钧七窍流血暴毙于天津督署内。

武士英、应夔丞、赵秉钧先后被人灭口之后，洪述祖也没有逍遥法外太久。四五年后的一日，洪述祖在上海黄浦江边偶遇宋教仁的长子宋振吕，被认出并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后被押解到了北京。1919年，在袁世凯死后3年，法院在继任总统黎元洪的授意下，判处洪述祖死刑。这是中华民国刑法史上首次执行绞刑。

而在早前，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另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点评

张镭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宋教仁遇刺案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受人关注，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政治刺杀事件之一。其受人关注的原因当然在于宋教仁当时的政治地位，以及该事件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争议最多则因为虽然主流的判断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默许（或者事后认可）的情况下，派人买凶刺杀了宋教仁。但是至今这一判断仍然仅仅停留在猜测的层面，并且这一判断当时即受到北洋政府矢口否认。于是，究竟谁是杀死宋教仁的幕后主凶至今仍然是个未决的谜题。

政治刺杀是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现象之一，几乎伴随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刺杀事件逐渐纳入到法律的范畴中。人们开始运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刺杀事件，用法律手段来惩治犯罪者，这是人类社会法治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刚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整个社会的法治生态还处于非常幼稚的程度。人们还不习惯运用法治思维去思考政治问题，更不习惯运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宋教仁遇刺以后，当局在调查中发现了刺客的委托人应夔丞，并通过查抄的文件发现应夔丞听命于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而洪述祖又听命于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但由于往来电报均用密语，所以具体内容究竟为何当时即有不同解释。但国民党人却一口咬定是袁世凯指示赵秉钧等人密谋刺杀了宋教仁，并由此引发孙中山力主动兵讨袁。当时，黄兴曾主张通过法律的途径揭开宋案的真相，但主张武力讨袁的意见占主流地位。随后的历史进程逐渐湮没了宋案的真相，以致至今谜团已无法轻易获解。

今天，如果我们运用法治思维来检讨宋案的处理，当然遗憾于该案在当时没有能够充分运用法律来解决；更遗憾于孙中山等现代型的政治人物尽然弃法律途径于不顾，仍然采用传统的方式解决政治刺杀事件。但该案的处理也同样使我们可以感知，在一个社会法治化的转型中，法治秩序的建立固然是举步维艰，法治思维的普及却更是任重道远。

参考书目：
《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张晓波著
《宋教仁》刘景泉 张健 王雪超著
《谁谋杀了宋教仁？》张耀杰著